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Philosophy

Hölderlin's Hymn "The Ister" on the View of the Way of Yin and Yang

翻译哲学导论

《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的阴阳之道观

蔡新乐 著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Philosophy

Hölderlin's Hymn "The Ister" on the View of the Way of Yin and Yang

翻译哲学导论

《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的阴阳之道观

蔡新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哲学导论：《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的
阴阳之道观 / 蔡新乐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305 - 15981 - 7

I. ①翻… II. ①蔡… III. ①荷尔德林, F. (1770~
1843) —诗歌—翻译—研究 IV. ①I516. 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314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翻译哲学导论：《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的阴阳之道观
作 者 蔡新乐
责任编辑 李振权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9.75 字数 277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5981 - 7
定 价 52.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1 绪论：翻译哲学的基本任务和一般意义 001

1.1 翻译哲学的界定及其基本任务 003

1.1.1 课题选择面临两大挑战 003

1.1.2 翻译哲学的性质和基本任务 007

1.2 翻译哲学所关注的节点及其一般意义 010

1.3 现代以来哲学的发轫以及经学的倾覆 012

1.4 孔夫子与海德格尔比较的可能性及其学术价值 015

1.4.1 孔夫子可能对海德格尔的补足作用 015

1.4.2 海德格尔翻译哲学视角下的“阴阳之道” 020

1.5 研究方法：以意守言的追求 026

1.5.1 心意、言与海德格尔的语言 026

1.5.2 《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的解读 027

1.5.2.1 海德格尔的思与孟子的“知心” 027

1.5.2.2 心意相通之中的《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 029

1.5.2.3 注一意于文并非“译意” 031

1.5.2.4 海德格尔所说的“意”之“爱” 032

1.6 思路与结构 033

2 翻译哲学的研究现状 053

2.1 翻译哲学的名与实 055

2.1.1	作为海德格尔的思维模态和德里达的哲学通道的翻译	055
2.1.2	翻译哲学的有名无实之一例：皮姆对翻译哲学的反讽与否定	
055		
2.1.3	翻译哲学的有名无实另一例：见不出视野的“哲学视野”	057
2.2	翻译哲学论域真正的建构	060
2.2.1	“语言转向”中的翻译话题	060
2.2.2	海德格尔的翻译哲学	061
2.3	作为一种哲学的翻译	066
2.3.1	《海德格尔，翻译与思的任务》的主要内容	066
2.3.2	可以解答的翻译哲学问题	068
2.3.3	翻译哲学对翻译研究提出的新要求	070
2.3.4	海德格尔的翻译哲学所引出的议题	072
2.3.5	思想与翻译的关系的论断始自尼采	082
2.4	反本质主义的问题的本质	084
2.5	并非局限于解释学的翻译哲学	088
2.6	小结：哲学缺席的翻译研究及其双重危机与“超越者”的“拯救”之道	
091		

3 海德格尔未及关注的荷尔德林的“明”与儒家可能的关联及其翻译学的意义 107

3.1	第一部分与《伊斯特》之中的“明”	109
3.2	“明”作为一种“存在”的样态——你“明白”“明白”了吗？	110
3.3	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之中的“明”及其汉译问题	112
3.4	海德格尔的“明”与汉语之中的“明”的儒家意向	116
3.5	海德格尔的“澄明”之“明”及其“语言”之“静默”的儒家意味与启示	118
3.5.1	“澄明”之“明”的非柏拉图倾向	118
3.5.2	“粹”之“优雅”与儒家之“幽”	121

3.6 小结 126

4 从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批判看他与传统翻译思想的不同 131

4.1 海德格尔对柏拉图二分法的批判 133

4.2 海氏笔下的柏拉图的感性和超感性二分 133

4.2.1 表征的意思及其危害 133

4.2.2 柏拉图主义:感性与超感性的区别 135

4.3 翻译的核心问题,就是意义=鬼魂吗? 137

4.3.1 艺术作品的柏拉图主义美学诠释 137

4.3.2 翻译研究之中的“意义/鬼魂” 138

4.4 小结:海德格尔与“翻译理论”的不同 145

5 存在之被遗忘 149

5.1 存在之被遗忘的研究意义 151

5.2 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之被遗忘与翻译研究之中的存在之被遗忘 151

5.2.1 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之被遗忘 151

5.2.2 翻译研究领域存在之被遗忘:严复的“信达雅”的理解与转译

154

5.2.3 存在之被遗忘另一例之一:亚里士多德的 *philia* 的转译 157

5.2.4 存在之被遗忘另一例之二:*anagnorisis* 的界定的汉语译解
161

5.3 赫尔曼斯的后现代的“话语”描述以及“文化转向”的实质 165

5.4 “存在之被遗忘”的“三种面纱”与“文化转向”的实质 167

5.5 小结 170

6 海德格尔对翻译的解说及其对希腊悲剧之中决定性的词语的讨论之中的“阴阳之道”的显现 177

6.1 引子:海德格尔此书的第二部分及“阴阳之道”的意义 179

6.2 海德格尔的“明”及其阴暗二重性的观点	180
6.3 存在论翻译思想的作用：“巅峰”之“学”与思想翻译	185
6.4 “阴阳之道”视角指向下的“人之颂”	193
6.5 “奇异”之三组合与“诗之持”	197
6.6 超越“存在”并且启动人的“回家之旅”的翻译	201
6.7 “存在”之中的“阴阳之道”	204
6.8 小结：诗之教化	208
7 译解之圆与回家之旅：翻译存在论	213
7.1 引言：可以道说的存在	215
7.2 诗人的“半神”定位于译者的纵向性精神开拓	216
7.3 “倒流”的伊斯特与翻译的自身之“圆”	221
7.4 小结：离弃自身的翻译研究的出路何在？	233
8 从“三”思及的存在之诗：以结尾为据对《荷尔德林的赞美诗 〈伊斯特〉》之审视	239
8.1 “圆足”与“三段论”	241
8.2 “阴阳之道”见于海德格尔	241
8.3 结尾之处见精神	242
8.3.1 为何“最后”亦即为“开始”？	242
8.3.2 《结语——大地上可有一种尺度？》内容简介及其译解的视角	
244	
8.4 海德格尔的“半神”及“三”对他的意义	245
8.4.1 诗人的诗人与“诗”的同一	245
8.4.2 海德格尔“三”的结构与阴阳之道	247
8.4.3 海德格尔笔下的诗人与《易经》之中的“体”“妙”与“感通”	256
8.5 从阴阳之道之三的结构看海德格尔的哲思译解	259
8.5.1 存在在译解的自然节奏中的回归	259

8.5.2 存在在“三的结构”之循环中的译解显现	261
8.5.3 逻各斯的“收拢”与“三”之“圆”	264
8.5.4 翻译的纵向性:海德格尔的译解与一般的翻译的差异	267
8.6 海德格尔对“represent”(再现/代表)的批判	269
8.6.1 海德格尔对 <i>Vorstellungen</i> 的批判	269
8.6.2 海德格尔的译解的“减法”	272
8.7 小结:来到语言与返璞归真	275
9 结 论	285
9.1 “元翻译”与海德格尔对哲学的解构	287
9.2 “圣贤”关乎我们的体悟以及荷尔德林的卓尔不凡	289
9.3 海德格尔的翻译哲学的重要性	290
9.4 翻译哲学应该关注的两个指向	293
9.5 回到孔夫子的“学”或可使翻译研究真正敞开	294
附: 《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结语: 大地上可有一种尺度》	298
主要参考文献	301

1

绪论：翻译哲学的基本任务和一般意义

1.1 翻译哲学的界定及其基本任务

1.1.1 课题选择面临两大挑战

本书试图从“阴阳之道”的视角来探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①之中的翻译哲学思想的问题。

《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是海德格尔少有的专门直接讨论翻译的哲学著作,该书是他1942年一次讲座的讲稿,1984年作为其《全集》第53卷出版。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的赞美诗所歌吟的“河流的本质”,第二部分对他所认为的荷尔德林诗中一向回响着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约前496—前406)悲剧《安提戈涅》(Antigone)中的“人之颂”中最具有决定性的词语加以译解和分析,最后一部分又回到荷尔德林的诗,强调此诗之所写就是对“诗的本质”的“命名”,因而,诗人为“本神”,处于人神之间,而且诗人即为“之间”。

要首先说明的是,此著所论的翻译包括两个类型:一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语翻译”(verbal translation)或“语言翻译”(linguistic translation),二是海德格尔所推崇的“思想翻译”(thoughtful translation)。后者可以将他对荷尔德林的译解包揽其中。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对海德格尔与儒家思想加以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翻译方面的讨论。而本章之所论,首先是触及这一课题所遇到的挑战;然后思及翻译哲学的任务及其基本问题,它应该关注的节点及其历史语境,孔子(前551—前479)与海德格尔比较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并就研究方法做出说明;最后对本书的写作思路和框架加以勾勒。

这一课题,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在翻译研究领域似乎还很少有人进行翻译哲学的探究,尽管隐含于有关著述之中的片断的哲学思想时见显现。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但翻译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在翻译研究之中的

作用等基础问题，依然有待探索。二是很少见到有人将海德格尔与儒家思想加以比较。两个挑战一方面显现出展开新领域的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在思想视角选择上遇到了阻碍。

就后者来说，读书所及，我们只是注意到了台湾学者袁保新对海德格尔和孟子（约前372—前289）进行了哲学比较。他认为，通过对孟子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第一，孟子的“心”指的是一种“存活的能力”：“当一个人愈是充分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他也就愈充分地彰显并了解到人之所以为人。”第二，“心”的操持存养成为孟子功夫论的重点，而人在实际生活中的“为不善”，无非指既成的公共世界对“心”形成不可避免的干扰、“扭曲”，但就“心”自身的明察能力而言，并不会被取消。第三，从基本存有论的角度切入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路，最重大的发现即是，“天”在孟子哲学之中，既不是宗教崇拜的“上帝”，也不是形而上学之中的“无限实体”“第一因”，思辨地展开对存在界的说明。孟子显然已将《诗》《书》中的“天”的信仰“存有论”化了，转换为明照生活世界中各种遇合之有无生灭的意义基础。第四，至于“尽心”如何“知天”，从基本存有论来看，“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作为无限的感通原则，若不能通过“由命见义”的途径进入生命的具体情景，仍然无法契接於穆不已、生物不测的“天道”。^②

袁保新的思想应该能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启发。因为，依其思路，或可继续推论，孔子（前551—前479）的“仁”本身即为“存在”能力的显现。因为，只有有了仁爱之心，生存于世才是可能的，也才是可行的。也就是说，“仁”本身就是存在所本应有的“天地之心”的当下显现，离开了这样的显现，生存便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意义上，“仁爱”作为人间关系的存在样态的显示，首先是人的存在能力的一种表现。有了这样的推论，甚或可以说，孔夫子的仁爱伦理就是另一种存在论。只不过，他所偏重的可能并不是哲学的玄思，而是一种生活实际的关系性建构的制度化和礼仪化。而依论者所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起初是以“生活”为中心展开的，到了《存在与时间》才转向“存在”，但是，存在仍是生活实际的另一种说法。^③换言之，在海氏那里，存在的析解仍是对生活的拓展和发挥。如此，海德格尔的存在/生活的一体

性,与孔夫子那里的仁爱的现实性便有了一定程度的可比性和类同性;的确,也只有走向这样的生活真实,哲学之思才有其针对性。也就是说,尽管有千山万水的空间之隔,但是孔夫子与海德格尔仍是可以比较的,而且,这种比较也是有其学术意义和思想价值的。要之,这样的比较有助于彼此印证和相互补充、强化。

就孔子与海德格尔的比较而论,有一个重要的典范可以参照。张祥龙在其《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拓与交融》^④一书中雄辩有力地指出:“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观(包括禅宗)在这最关键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认为终极的实在不管叫‘存在本身’也好,叫‘天’或‘道’也好,只能被理解为纯粹的构成境域。称之为‘境’和‘域’,取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即终极既不是任何现成者,又活生生地在场,使我们领会当下涉及的一切可能。”^⑤有了这一洞见,我们的比较也就有了一个基础。这就是,孔夫子与海德格尔在思想指向上的这种一致性,可以确保我们的比较是朝着一个既定目标前进:生活本身的力量,始终是“在场者”的所在,而各种“活生生”的现象最终会凸显出“异”的作用。张祥龙强调:“西方哲学在海德格尔发生了某种在中国思想看来点铁成金的转化,使得中国人可以在这‘一点’澄明的发生态中‘心有灵犀’地通达西方思想;反之亦然。”^⑥此书视野开阔,精彩纷呈,有关论述的确能启人深思。

另一方面,比较哲学近年来的成果,也可为我们提供思考的动力。比如,张维所著的《海德格尔、罗蒂与东方思想家》^⑦通过对海德格尔与日本人的对话的细读,强调比较哲学是走出哲学或曰西方形而上学的一条途径,因为,这样就可以引入东方思想。的确,比较哲学的展开,可为哲学研究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势必提升东方思想的地位,至少是不再可能将之视为“思想材料”。不过,作者最终将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佛家相互比较,认为二者在主体的空洞及其没有自性方面彼此一致。^⑧这种比较我们是不能认同的。这是因为,佛家毕竟是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此世的,在此世被视为与价值取向相反动的情况下,如此比较可能会突出有关思想的反面,此即走向一个可以拯救的所在。而这可能也就是书中所引的文字所强调的,只有向阿弥

陀佛祈祷才能得到拯救的意味。^⑨一方面,这是与海德格尔的存在/生活本身相脱离的,甚至走向“超验”的一面;另一方面,这样做无助于说明海德格尔的基本创建来自他的“方法”的与众不同。这样的方法到底是什么,这是非常需要探讨的。与此相反,比较哲学转入宗教维度的比较,会脱离生活的原态,甚至走出生活,同时将海德格尔的思想推向另一个极端,会让人误以为他最终就是要通过“皈依”来解决“存在”问题。

实际上,海德格尔的“我”尽管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所谓“主体”或“自我”性质的东西,但也并不一定就是佛教所说的“无自性”的那种“我”,否则他所说的“本己”“事物本身”以及“本质”等将无从落实。倒是儒家的“虚灵不昧”、始终追求“明明德”(《礼记·大学》)的“我”,相比之下才是适宜和海德格尔相互比较的。因为,作为这样的“虚我”,其贯彻一生的,就是对“学”的念念不忘、持之以恒。因而,杜维明(1940—)称中华文化是一种“学习文明”^⑩,也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另一方面,至于海德格尔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性的生存动态,在儒家那里也有极其分明的表现。因而,所谓“易道”不仅是儒家之精义,而且是中华文化之真精神。若是依此展开比较,则可能更有意义。

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便与此书的指向完全相反,或可认为,是我们这里展开比较的另一个“索引”。杨栋所撰写的《后期海德格尔与孔子思想的异同》一文^⑪,尽管篇幅不长,但颇有卓见。作者以海氏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为视角,认为海氏强调生命自觉的重要性,主张人类应原始地生存,并且揭示了不恰当的根源和危害,指出了以适当性为旨归的人类生存方向。此文的亮点在于,作者指出,后期海德格尔与强调生命自觉的孔夫子在“生命自觉”“源始境域”以及“生存方向”方面有着共同的主题,并且对二者的异同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比较。

不过,读书所见,我们并没有在有关著作之中看到对一个基本问题的讨论,这就是上文已经提及的在思想方法或曰思维方式上,孔夫子和海德格尔究竟是否出现过一致之处。而我们这里所做的,也就是对此一课题予以关注。这里有一个预设: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材料对之说明,尤其是,如果二者

趋同,那么,首先,思想比较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局面,这就是,中西在孔夫子和海德格尔这里走到了一起。而这意味着,中国哲学再也不会是西方哲学的附庸,而是可以真正与之对话的一种资源力量。其次,这样的预设,用之于翻译研究,则可表现出一个基本取向:中华文化的基本思想,与跨文化交流在根本指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会生活,就应该懂得如何进行翻译。再换言之,这一课题的讨论,可能引出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思考:儒家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思想“系统”,而是一种可与西方相媲美,而且能在相互比较当中适用于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的思想资源。

至于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目前已经问世的数种论著(详见第二章)倒是可以作为我们继续探究的参照,尤其是有关翻译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之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其一,海德格尔的哲学创新思路,是要回到“前苏格拉底”时期,进而开创出“新的开端”,这说明他是在进行一种翻译或解释工作,即以新的译解来营造新的哲学思想。其二,他的诸多著述实际上都是以希腊哲思为语境来展开的,比如,《存在与时间》的题词就是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的《智者篇》之中有关“存在”的思辨。^⑨其三,或许正是因为他的哲学创见首先是立足于传统的,因而,翻译的工作就变得比在其他哲学家那里重要得多,因而,他在多部著作之中对翻译都进行了直接而又专门的论述。比如,《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⑩以及《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若是对他的有关论述加以细读,不仅对探究他本人的哲学思想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同时,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哲学研究也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1.1.2 翻译哲学的性质和基本任务

翻译哲学,以其名之所示,无疑是研究翻译的一种哲学思想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对翻译的系统性的哲学研究。因而,毫无疑问,它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目前还很少有人承认,甚至在基本的“图式”(schema)之中还没有安排它的位置。^⑪很难说,哲学作为问题视域,是否真的已经进入研究领域,或者说,是否成为学科建设强大的力量资源。但可以确定的是,翻译研究领域的有关探究,还没有重视哲学对之可能的提

升和丰富化。依此视之,翻译哲学的研究目前的确还处于起步阶段。而我们所要做的,也就是一种初步的建设工作。其中最为主要的当是关注翻译哲学所能显示的翻译的本质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或许有了哲学思辨的介入和协商,才有条件探究翻译的本质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

因此,第一,翻译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哲学应该保持同样的倾向。也就是说,如果说普通哲学是以形而上的思辨来显现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的原因,那么,翻译哲学也就是研究翻译成为翻译的根由。第二,翻译哲学便具有自身的特殊对象以及规律性。它的作用当然是要强化翻译理论的思想品格,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其理论的指导作用。换言之,我们认为,翻译哲学可以扩大翻译研究的领域,即一向所认为的那种只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研究,应该扩展为三个层面:翻译哲学、翻译理论以及翻译实践。这三者,都是翻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所应囊括的。而在这三者之中,翻译哲学应该是提取理论精华进而加以指导的思想资源:它不仅要根据翻译实践的实际来厘定翻译理论的框架,而且,在根本上要为翻译理论的取向设定最为基本的框架。那种轻视理论,一味突出实践的思路,在这里会遭受到最为根本的质疑:翻译哲学即为理论阐发的出发点和理论思想的“集结地”,也就是翻译理论为解释自身张力并且形成系统性的一种思想总结。它的最终作用还是要通过翻译理论这一中介来调整、说明、制约或影响翻译实践,并且规定和判断后者的历史性和文化价值。

按照这一界定,也可以认为,作为智慧之学(the study of wisdom)的哲学,它的西方倾向与作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生命之学(the study of life)^⑩的哲学,自有其可通之处。这是因为,智慧之学应首先是生活的智慧之学;而生命之学也首先表现为智慧的生命之学。那种追求片面深刻、排斥异己的学问,因为不具备对话的可能而难以被认同^⑪;而突出包容性,强调调适(《淮南子·诠言训》)、上遂(《庄子·天下》)的学问才是理想的智慧之道。智慧之学偏重知性的规则和思想的系统化,而生命之学求的是生命调适的实践化和日常化。一个偏重理性,一个倾向于具体的生活,两者相交,其融合的取向才是这里所说的哲学所能显示力量的所在。

也就是说,我们的翻译哲学本身应是对中西哲学融合的一种结果:在对其进行建构的过程当中,翻译哲学本身就应该成长为生命的智慧之学。它不仅关注二者之同,还要突出二者之异,而且在对此分析的基础之上寻找新的生发点和潜在力量。

我们选中的是孔夫子和海德格尔。一方面,二者都是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本人是西方少有的对东方保持兴趣并且与东方思想显示出颇多契合的一位哲学家。而就本课题而论,我们是以海德格尔本人的讲课稿《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周易》和《论语》等儒家典籍作为可以互文解读的思想资源,以期展开比较,并在比较的基础之上对海德格尔所提出的翻译哲学问题进行细读和分析。

如此处理,是因为,既然是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来审视翻译问题,最主要的着眼点是对历史的反思。正如论者所说:“……当一个文化或者宗教群体将自己的智慧、力量或神圣性视为高于其他所有群体时,暴力与迫害就发生了。”^⑩如此反观近代以来的中西交流史,不是始终有一种文化、一个群体认为自身高于一切,凌驾一切,并且以如此炮制出来的优势,试图统治这个世界,进而规约其他文化的历史走向,最终强行将所有的文化拉进所谓的“现代”之中吗?不是始终有一种力量,以自身为标准,在异化所有其他文化,进而试图解构别的文化系统,最终达到文化专制或曰文化帝国主义吗?不是始终有一种思想,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势,试图将整个世界都纳入自己统辖的版图,施加影响、加以归并甚至予以同化,最终希冀能够形成“新的神话”吗?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如果依然如故保守滞留于既定的翻译研究领域,充其量只能对“现代化”的“学科”之中的现有问题有所论及,而不可能触及历史问题甚至会对历史造成遗忘。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探究是停留在思想之外。也就是说,只有回到历史的节点上,研究才可能是思想意义上的学术探讨,而不是或不仅仅是完全学院化的:停留在某一个或某一些课题上的探究,而且仅仅是学者之间的探究,而不一定具有未来的指向。回到历史的节点,就是要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展望未来。而未来的学术发展,必然是思想和哲学比较路途之上的发展,是中西兼顾的发展。